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

——访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散文家雷达

■本报记者 舒晋瑜

雷达以文学评论著称,但他的散文真诚质朴,鲜活泼辣,贾平凹称之“海风山骨,气势褰挟,既擅长对事物作横向的大思考,也善于在寻常物理中提升幽独玄机”,“有一种铁的质感”。

“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雷达说,自己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阵势。

这是他的自谦,尽管“零零落落”,如今也成“阵势”了。前一阵子,他写了一篇《韩金菊》,首次披露这段隐秘的心事,只想能在《作家》发表,表达对韩金菊的纪念足矣。但是文章发表后,他便控制不住局面了。先是在朋友的要求下,散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紧接着诗人高平为此写下《韩金菊,雷达的初恋》一诗,没想到点击率上万,留言之多,超乎雷达的想象。

他曾说,真正能够叩响心弦的才是好散文。《黄河远上》(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在书中,他还原了与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风俗史、精神史、心灵史,表现了在极限状态下历史的呼吸、人性的残酷与微妙。

中华读书报:《费家营》《梦回祁连》《黄河远上》等作品,曾贴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高的点击率,《费家营》甚至被评为2015年“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散文类的榜首。可否谈谈您对新媒体的认识?你认为,您的散文吸引网友的秘诀是什么?

雷达:情况确是这样。在公众号上,我的有些散文,作为文学作品而非社会新闻,点击率一般都至少在六千左右,加上其他公众号的转载,可以过万,这就不算少了。而且,我的文章留言特别多,变成了围观的话语场,不少人在上面发感慨,忆往事,说心事,说到伤心处会流泪。有许多陌生人的留言,甚感人,我一直很珍视。这就是微信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是传统纸媒所没有的优势。

我也好奇,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爱看。渐渐悟出,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冷峻,质朴,丰腴之外,如何打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也即实现某种“穿越”,对唤起读者是很重要的。我写的有些东西太久远了,年轻人未免隔膜,怎样引起阅读兴趣,让他们觉得并不久远,而且仍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血脉相关,是个问题。比如,《费家营》的开头,本是朋友带我游览一个新景点“黄河湿地公园”,不知为何,我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旧景重现,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呆立无语。我惊恐地想,这总不会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几乎累死,连抬着沙筐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一块地方吧?很不幸,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正是那块地方。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大跃进”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于是,当年“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耳边炸响。昨天并不古老。回忆的大幕就此拉开。这个开头被有位读者称做“华丽转身”。但不是出于技巧的需要,而是生活本身就这样巧合。

中华读书报:关于《黄河远上》的编选,您说要让这本散文集“呈现出饱满的感性血肉,要用‘苍茫辽阔,委婉多情’的意境和形象去感染人”,您所理解的“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什么?您最新的散文《韩金菊》写遥远而凄美的初恋,特别令人感动。这篇散文,和过去的写作心态有何不同?把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剖开给读者,您有过顾虑吗?

雷达:我以前也出过几本散文集,因为字数少,把那些杂文,随笔,序跋,议论全放进去,以增厚度。它们当然也都叫散文,但心中总觉歉然。另一方面,因为我一生做文学评论,惯于用概念、理性、逻辑说话,这一次,我要完全让血肉饱满的形象说话,所以我编这本书,剔除了议论和思辨色彩的文字,编了一本比较纯的叙事型的抒情散文集。形象是多义的,形象是内敛的,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更易感人。

“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上海一位文友程庸对我散文的评语,我比较认可,觉得接近于我的追求。苍茫可能与我的气质,我所写的对象比较契合,大西北本身就是苍茫的,我不但写甘肃,在《新阳镇》《皋兰夜语》等作中,富有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陕西宁夏青海新疆我都写过,如《走宁夏》《依奇克里克》《乘沙漠车记》《圣果》等。至于是否委婉多情,我不好说,重要的是发现珍贵的细节,写出人性的复杂,写出别人虽经历过却道不出的感受,亦即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若做到或基本做到这些,文章就成功了。我只是在努力中。我常想问别人也问我自己,这些以亲身经历为背景的东西,究竟谁会看,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人们需要知道的,是有价值的,它有可能吸引哪些人的眼睛和心灵?是否可以这样说,它包含着历史情景的,西部人心灵史和文化史的信息,一个人如何成长的过程,人的灵魂怎样遭遇风暴袭击的,人战胜自我和环境的隐秘的关键,以及从这个人身上折射的近六十多年来的动荡与曲折,它可能还有激励西部封闭境遇里的青年的作用,激起他们的自豪感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从自卑中挣脱出来。总之,不是简单的褒扬,也非故作高深,不是要迫不及待地肯定什么,更非钓名沽誉,而是以人为本,写出性格来,写出人生来。

《韩金菊》我原本没打算写,不想触动一生的痛,随着一天天老去,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藏在心里总觉堵得慌,再不写就可能无力写了,永远沉埋了,心有不甘。可一旦写起来,却又伤心得写不下去。一切都是真实的,无一丝虚构。我甚至能想起她家几次搬家的门牌号。只是为了了却心愿。我想能在《作家》上发一下就行了,不愿更多的人看到。后来好几位作家,刘兆林,弋舟,张雅文等人在杂志上看了,还有我的博士生们,都来电话,希望我一定要拿到微信公众号上发。我的看法变了,不再怕。没想到点击率上万,留言之多,超乎想象,除了一些是朋友,文艺界人士留言,绝大多数是普通读者,说它“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读来“几度哽咽”,甚至“每读一遍,都要流一次泪”。我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总结,我同意这样的留言:“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的交叠合一”。

中华读书报:据我了解,《黄河远上》上市不到一个月,就销出了一千多本,这应是不错的业绩。您的散文真诚质朴,同时也特别厚重。“真”是我阅读的第一感受。您是名家、大家,很想知道您的作品靠什么吸引人,打动人,您自己是怎么看的?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展示给读者什么?还是仅仅完成自己的某种心愿?

雷达:我同意你说的,“真”是第一感受,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所在。但是,真实是分层次的,表象的真实,较深层次的真实,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是各不一样的。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观察、体验、内省的深度,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这是无法伪装的。

我在取材上没有任何优势。我既不是出身名门之后,将相之后,耳濡目染过多少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能自然而然地写出读者渴望了解的名人逸事,历史传奇及某些秘密;同样,我虽然一生也是磕磕绊绊,但并没有九死一生,大起大落,骇人听闻的苦难经历,那样的人下笔即能感染读者并且触发历史反思。我只是个道地的平民之子,母亲是西部一个穷音乐教员,她从我三岁起即终生守寡,拉扯起了我和姐姐。她作为单身女人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某些往事,我至今想来心中还存恐惧,使我多次都无法冷静的、完整的写出母亲。我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按说有什么好写的呢。

但我同时认为,我仍然可以告诉读者很多,我这个人,或这颗灵魂,他做什么既重要,也不重要,他有何业绩既重要,也不重要;但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我还感到,我是个不善于遮饰自己的人,比较率真的人,却也同时是个叛逆的人,没有多少世故和城府,曾被认为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从小就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意识,因而始终比较“落后”,我在文革初期有过被认为可判重刑的言论,那是西北的一个我并不熟悉的“朋友”的揭发,他为什么那时还会惦着几千里外的我,至今不解。可把我整苦了。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很正确。我偶然地步入了文学界,做着被称为文学评论的工作。如此而已。

我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矛盾,我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两条河流关系密切,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我奔跑着呼喊着去看黄河“开河”的壮观;我在故乡渭河的臂弯里沉酣地睡去。我的身世,父亲是天水人,母亲是临夏人,一个接近关中文化,一个接近游牧文化,这造成了我的粗糙和敏感并存的性格。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经历了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直延至新世纪,像一条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密集。在相当的时间里,我只是一个学生,但是,我的眼睛从一个自己的角度看到了许多难忘的往事。弥足珍贵的还因为,我出生并生活到二十多岁的西部,其情调,风俗,生活场景,文化传统,都有丰富的意蕴,到今天,它仍然是神秘的,被遮蔽的,它们的价值有必要得到彰显。

作为一个跨越了众多剧变年代的人,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敏于感受的,惟其单纯,不掺杂质,反而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心灵的历史。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或者多么小的人物,多么尊贵的人物,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更耐久。

中华读书报:从有记忆的时候写起,您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亲历的,毫无粉饰的,同时也充满各种历史的或个人的波折,可读性非常强,让人读了放不下。这些散文的写作时间不同,应该是您的一个散文选本,那么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在写作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你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你在处理题材时有何心得?

雷达:这本集子确实有很强的亲历性,在场性,回忆性,都是围绕着我的切身经历展开的。现在细想,我受影响的著作不少,但受影响最大的应是《朝花夕拾》。那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后由先生改为《朝花夕拾》。“朝”意谓早年,“夕”表示中晚年,即早上的花朵晚上来拾采。先生回忆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人事,每一篇都是那么沉郁而亲切地展示着世态变迁,人情冷暖、历史沧桑,风俗礼仪,且感情蕴藏得那样深沉。先生对社会、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亲人师友的诚挚感情,只有反复读之才能心有所得。我虽不能至,却一直心向往之。

我的散文一向以写西部者为多,但近年所写的“西北往事”系列,约八九篇,每篇一万多字,却与以前的有所不同。这也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正如评论家古耜指出的,首先,这组作品是自传体的。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全无粉饰地敞开,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场感,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第二,这组作品书写作家经历,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很自然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于是,作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开满了社会心理,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地域风情,时代氛围的花朵,它们交织在一起,分明构成了甘肃省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的部分。

的确,民间记忆,个人化记忆的价值在今天已是无庸置疑,但我不太主张过于纯粹的个人化记忆,面太窄,易陷入一己的悲欢,圈子划得太小,意义亦会受限。个人记忆和时代风雨裹胁在一起,无形中成为风俗史,心灵史的一种表达,才会走向深厚。

如何做到既带有自传色彩,但又不是刻板的自传,而具有散文的广延性,抒情性,联想性,是值得思考的。《黄河远上》一开始,我写了亲见的西北战场最残酷的恶战——兰州战役,当然是以孩子的眼光来看的,当时我六岁,血与火的记忆却终生难忘。接着写了震动全国的“邱家血案”,也不是故作惊人之笔,是我每天上学的路上发生的真事,凭记忆写出,它们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不可拆解。不写反而不真实了。《梦回祁连》是以四清运动为背景的,既无法不交代四清时的政治情势,但又不能陷入政治评价中不能自拔。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运动,从何处下手呢?这是很难驾驭的,几乎无法写。但这段酷烈而传奇的生活怎能忽略不写?要摆脱事实的束缚,说到根本上,就是要写人,人的心灵体验,而非仅仅交代事情过程。我是以“我”为中心,一面连结乡土人物,主要是环子父女的遭遇,一面是工作组长等人。人虽少,但够了,将其他推到背景,主要的空间腾出来,写当年河西走廊的风土人情,写出人性的美丽与残酷,写出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情调”和“风光”。环子这个农家姑娘,是真实存在的,但也集纳了其他人物的特征。有读者表示遗憾,觉得我写她少了,还想多看她的事,甚至还希望我和她“擦出火花”什么的,在那时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吃食,蒜泥拌青稞面鱼鱼,男人戴“牛吃水”的帽子,河西女人裹的头巾,有趣的方言,“烧房庄”的堡子文化,涝坝水,打胡基,以及当时唱的革命歌曲,环子送我的两盒新建牌的香烟,每盒一毛一,对农民来说是够重的礼了,还有那个红皮笔记本,等等,这些东西在今天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连民乐当地人看了这文章,都觉得如在梦中,却又喜欢。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我的散文观》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而非“呆文”。您如何理解“活文”?

雷达:我确实说过,喜欢“活文”,不喜欢“呆文”的话。比如,一度文化散文成风,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我认为有开创性,走在前面。但后来忽然很多,有的看上去很渊博,什么都知道,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这未尝不可,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但罗列太多,掉书袋,性灵就不见了,便“呆”了。还有,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有极深厚传统,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也容易“呆”。我想,“活文”恐怕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这种境界和格局,与作家的知识积累、文学素养有关,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鲁迅先生说,“开掘要深”,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够我们消化一辈子。我很看重一篇文章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我也在摸索,还是以后专门另找机会再谈吧。我的“西北往事”还在继续写,接下来是“我的大学”,“干校的日子”等等,值得写的事还有不少。

在15载学术跨越的背后

■王一川

焕亭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时于2002至2004年间指导过的教育硕士生(另一位指导教师是陈雪虎教授)。记得那时她同其他十几位教育硕士生一道从中学考上来,我作为当时的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统一接待他们并随机分配给教研室各位导师。焕亭同另外三名同学一道由我指导。这批在职硕士生与我和同事们过去带过的学术型硕士生相比,虽然学术基础偏弱点,但求知欲却异乎寻常地强烈。起初一段时间,焕亭的表现并不活跃,多是在埋头听课、读书,偶尔发言似也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而我自然也没对她将来能做学术抱有什么期待,一心想的还是完成学校交给的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的任务。但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当时令我印象较深的还是焕亭那双清秀、沉静而又明亮的眼睛:它们似乎总在默默工作,吸纳以及内化,仿佛具有随时把一切都记牢在心、融化于血液中的本领。她在我的“文艺学专题”及“文艺美学专题”等课上总是要么全神贯注地听讲,要么低头阅读和思考,有时也在课余时间来问点问题,但更多时间是默默无闻地听课、看书和思考,整天都如饥似渴地饱吸新知识,其刻苦精神令我感动。尽管如此,我那时对这位来自中学的硕士生能在学术上提升到什么程度也没敢多想。

直到有一天,翻读她交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初稿时,我才吃了一惊:她居然想到用我倡导的“修辞论美学”思路去重读中学范文朱自清的《背影》,并且像我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里分析丁玲的《韦护》和洪灵菲的《流亡》等那样,要从朱自清的字里行间“发现”作者本人对待父亲的双重态度时,我不得不在心里对她另眼相看了:这丫头脑瓜子还真灵,有一双我十分看重的解读文艺文本的慧眼!待她后来完成论文并提交答辩时,果然受到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我那时甚至欣喜地想过,凭她练就的这套文本分析本领和其他综合素养,回到中学教师岗位后,没准还真能在语文教学改革领域做出点特殊业绩来。

过了几年,陆续接到焕亭的喜讯:她把硕士论文中的观点带到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表,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甚至权威人士的好评;再后来,她从中学调到平顶山学院教书,成了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她终于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考上了博士生!接下来的事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她苦读三年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答辩,回到平顶山学院继续任教,很快完成从副教授再到教授的晋升历程。顺便说,她这些年来妥善处理了个人学术跨越与家庭的可能的矛盾,夫妻恩爱、全家幸福如初,值得对她和她的家庭点赞!

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专著,从她精心敲打出来的密密麻麻而又齐齐整整的汉字间,我“看见”她这十多年来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坚韧不拔的追寻者身姿及其深深的跋涉脚印!它们仿佛在无言而又有力地告诉人们:是真金总会闪光!而金子的闪光其实是以坚韧去磨砺成的。

回看焕亭的硕士生阶段可知,眼前这部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可以说早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要将硕士生阶段的学术训练沉落为更具学术含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必然意味着更加艰辛的精力付出和更具创造性的系列学术发现的聚合,这中间当然会包含她的博士生阶段导师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指点和帮助。至少从如下被她作为对象直接研究的16部传记作品书单里,就足可见出其阅读与研究量之大及探究路程之艰辛了:钱理群《周作人传》、袁庆丰《郁达夫传》、宋炳辉《徐志摩传》、陈丹晨《巴金全传》、林志浩《鲁迅传》、田本相《曹禺传》、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黄昌勇《王实味传》、朱珩青《路翎传》、金介甫《沈从文传》、韩石山《悲情徐志摩》、王一心《〈小团圆〉对照记》、施建伟《林语堂传》、余连祥《茅盾传》、肖凤《冰心传》、季红真《萧红全传》等。

要在阅读这批当代学者撰写的现代作家传记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一种双重理解,即既理解被传记作家所研究的现代作家、又进而研究传记作家本人,势必需要一种双重付出和创造。在这项双重付出和创造的工作中,跨越时代、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文化选择及个性等诸多距离之间而展开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莫大的难点和重点了。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意味着实现被作传的作家的主体性与作传的学者的主体性之间的理性分析。由此看,焕亭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颇有挑战性和难度的题目,而从这部经多年修改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专著中,她的目的基本实现了——该书清晰地构建起由被作传的作家与作传的学者所共同拥立的双重主体性,从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道路上确立了一块烙上研究者自己独特个性印记的醒目路标。

在为焕亭的学术跨越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妨对该书中的未尽事宜提出一点颇不近情理的苛求或更高期待:正像她在硕士论文中对朱自清的《背影》的独特发现一样,在她所精心建构的传记学者的主体性内部,是否也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有待于深究的疑难呢?例如,传记学者的主体性内部,意识文本与无意识文本之间就一定是一致的吗?难道不同样是一种人为建构么?既然是人为建构,就理应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未定点啊!当然,这种苛求或更高期待不会影响该书已取得的学术成绩,而只望她在将来的新著中能有所回应和补充。因为我确信,焕亭绝不甘心停留于现在,而会继续开辟新的未来。